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杨蕊, 蔡艺, 余莉萍, 边柯
(广西大学 体育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是实现体育非遗在旅游领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研究依据新古典“结构-功能”理论, 对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模式分为物质性结构融合模式, 延伸两者物质空间, 形成民族特色体育小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文化园等场所, 具有创新融合场域的功能; 习俗性结构融合模式, 生产体育非遗旅游赛事、表演等产品, 具有创新产品形式与内容的功能; 制度性结构融合模式, 重新组合资源, 形成体育节庆旅游品牌活动, 具有文化传承与认同的功能。并基于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发展的代沟关系、地方民族与权威话语的失衡关系、传统与现代的联结问题, 提出了激发文化共振, 构建良性融合环境; 建立共生机制, 重塑融合关系; 数字化赋能, 弥合传统到现代融合过程等融合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南岭民族走廊;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旅融合; 新古典“结构-功能”理论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4-0053-07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Nanling nation corridor

YANG Rui, CAI Yi, YU Liping, BIAN K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Nanling nation corridor is a concrete practice to realiz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structure-func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od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Nanling nation corrido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is divided into three forms including material structure integration mode, extending the material space, forming ethnic sports town, sports leisure town and sports culture park, with the functions of innovative integration field; the custom structure integration mode, the production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events and performance products, with the functions of innovative product form and content; the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tegration mode, recombining resources, forming the sports festival tourism brand activities, with the function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gap between sports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un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nationalities and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is research also proposes som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paths including stimulating cultural resonance, building a benign integration environment; establishing the symbiotic mechanism, reshaping the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bridging the traditional to modern integration process.

Keywords: Nanling nation corridor;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structure-function"

收稿日期: 2024-1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TY100);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FTY007); 2024年广西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课题。

作者简介: 杨蕊(1990-), 女, 博士,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E-mail: 249325162@qq.com 通信作者: 蔡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应持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摆在突出位置,重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旅游进行融合发展,对其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作用。2023 年《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在确保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的融合^[1]。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能够拓展传承实践形式,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使旅游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非遗与旅游融合”的研究大致分为 3 个阶段。首先,以生产性实证研究为主,研究不同地区非遗与旅游开发的张力、对策、评价等^[2];其次,提出融合或耦合的概念,以传承性理论研究为主,从不同学科的方向和角度上探究非遗与旅游融合的产品开发、互动机制、模式、策略和作用等^[3];最后,以技术性创新研究为主,研究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创新模式、路径以及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精神、文化、社会作用等^[4]。而其中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的研究是从其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发展而来,包含体育非遗项目个案与旅游融合影响因素、特色民族资源为主的民族特色体育非遗、民俗村寨的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开发模式、价值评价等田野调查的研究和从理论视角出发的融合机制、治理和对策等研究^[5-6]。研究内容相对集中,从理论视角探究其融合模式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的研究更少。南岭民族走廊最早由费孝通先生于 1981 年提出,其先后 4 次阐述南岭民族走廊是重要的地理通道及其研究的必要性^[7-8]。基于理论与现实需要的背景下,研究采用新古典“结构-功能”理论,研究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内在关系与模式,并为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创新发展的平衡困囿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论,并推动南岭民族走廊地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进程。

1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内涵

1.1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的概念

南岭民族走廊是以南岭山脉为中心,地形复杂,处于依山川自然走向呈条带状的地带,既便于民族迁徙流动又便于其躲避以求自我保存,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的摇篮^[9],外延向长江、珠江流域的交汇区域辐射,涵盖以湘、黔、赣、桂、粤为主要分布地的壮族、侗

族、苗族、瑶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及其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空间。该走廊不仅是地理上的通道,更是历史上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桥梁,各民族在此形成和发展了种类丰富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认为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位于南岭民族走廊区域内的各民族以身体活动为表现形式,通过口头与身体示范的方式,代代相传,具备竞技性、教育意义和娱乐功能的民间、民俗及民族传统体育技艺,以及在这些体育活动中所运用或产生的器械、相关物质载体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空间的总和。

其具体特征如下:(1)具身性。南岭民族走廊是通过身体活动体现体育非遗的文化表征,同时,体育非遗活动主体的身体创造性和决定性使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在世代传承中发生了衍变。(2)民族性。南岭民族走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迁徙往来形成和发展了种类丰富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9]。如瑶族香草龙、壮族的炮龙节、侗族的砵板陀螺、抢花炮等。(3)传承性。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的记录,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符合人类社会的习俗惯制,通过家庭、师门和社会的方式进行传承。(4)濒危性。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南岭民族走廊内的仡佬族总人口为 27.72 万、毛南族有 12.41 万、京族仅为 3.31 万^[10]。由于受人口流失、城镇化、经济化、社会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体育非遗赖以生存的传承场景和仪式等社会环境的解体,部分体育非遗失去其原有的活态,处于濒危状态。

1.2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将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看作两个独立的系统,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1)空间重叠。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主要是各民族在生活空间内进行的生产生活、祭祀、娱乐等体育活动,而旅游发展所需要的自然、物质、生态、文化等资源均处于各族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空间内。两者发生的空间范围上具有重叠。(2)功能互通。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的形成本身便具有文化、社会、经济等多元功能,而旅游的核心是经济功能,其中也蕴含了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尤其是旅游业日益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通过满足人们需求,生产出各种文化体验类等服务产品,推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两者在功能作用是相通的。(3)主体交叉。体育非遗发展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企业、非遗参与者和传承者等,而旅游业发展的主体也包括政府、企业、社会、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等。因此,两者发展的主体存在交叉。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呈现出

相辅相成的动态关系,为其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1.3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的现实意义

1)创新体育非遗保护观念,创造体育非遗传承活力。

南岭民族走廊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与旅游的融合,正是推动体育非遗在旅游领域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这种融合打破了体育非遗仅作为遗产而“只能保护不能开发”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体育非遗作为南岭民族走廊民众生活产物的“活态资源”地位^[1]。通过创新理念,推动体育非遗资源向生活资源和资产资源的转化,实现了体育非遗活态保护和产业利用,进而达到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一方面,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面临传承失活、保护不充分、发展受限等问题,通过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形成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融合能够创造体育非遗的经济价值,进而提升保护体育非遗的积极性。将文化遗产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是最具文化延续性和创造力的保护方式。

2)激发产业内生动力,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

南岭民族走廊由于市场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创新,外加缺乏创新动力,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对外开放合作不足,限制发展空间等问题,长期制约着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12]。然而,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将原本相对封闭和狭窄的地域体育文化市场与更为开放的旅游市场相结合,通过重塑市场供需关系,将体育非遗与现代人民生活相连接,推动体育非遗产品的转型,开拓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市场中的新场景,不仅促进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转型,还推动了南岭民族走廊地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型产业的培育,推进地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例如,壮族抛绣球作为传承千年的体育非遗,在靖西旧州村有一半以上的村民从事绣球相关的工作,并在政府管理和企业的扶持下,与旅游业进行融合,建造了绣球风情街、壮族生态博物馆、非遗展示馆等,靖西年游客接待量超过200万人次,企业通过培训、聘请村民,实现当地经济和就业率的提高^[13]。

3)凝聚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民族发展的精神资源与文化基础。它不仅是连接民族情感、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而且在促进文化自信、增进民众合作与凝聚力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促进了多民族、跨区域的民众交流,打破了

民族间融合的障碍,展现了各民族与文化群体间多样化的互动交流模式。这种融合不仅使游客在体验体育非遗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南岭民族走廊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样性的认识,还促进了南岭民族走廊地区各族群众在游客的互动中树立民族自信,理解文化的多元性,进而塑造对社会整体观的认同和对国家认同的坚定信念^[14],成为各族人民文化交流、情感增进的桥梁。其融合遵循了民族团结发展的历史逻辑,为民族间的交融提供了动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路径。

2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的理论基础及模式

2.1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在探讨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问题时,研究者们主要借鉴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费孝通的“文化开发利用观”。这两种观点呈现出二分对立的状态,一方面强调以原真性为核心的完整性保护与传承,侧重于体育非遗的文化静态功能;另一方面则主张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创新性保护与传承,侧重于体育非遗的社会功能。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洗礼流传至今,主要得益于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习俗的融合与传承及其在社会变迁中展现出的生存、适应与发展的能力。然而,如果“过度保护”体育非遗,则可能导致其在现代社会中缺乏适应性和主动性,所产出的产品亦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衰落乃至消亡^[15]。因此,在体育非遗的“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除了保护利用传统对现代的二分对立,还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共存、联结等多重维度^[16]。

张继焦在综合“文化功能论”“文化开发利用观”“内源型发展”“竞争优势”以及“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等5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该理论主张文化并非静态不变,功能会随着所处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而发生转变,文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产生新的功能与结构^[17]。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将文化遗产划分为本体结构、外在结构和自生结构3个分析维度,其中自生结构作为一种结构性的遗产,从文化遗产可开发利用的角度,将其分为物质性结构遗产、制度性结构遗产、风俗性结构遗产^[18]。并在文化遗产的发展、非遗产业化分析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研究中应用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新功能形成新结构,不仅能够现代环境中“锦上添花”,也能在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雪中送炭”,甚至可以推进当地产业结构的现

代化发展^[15]。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作为一种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了基本的社会文化功能,这些功能随着族群迁徙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经历退化、消亡、衍变和拓展的过程。在现代社会场域内与旅游融合,展现了新的动能,尽管在完整度上有所解构,但却延伸了体育非遗部分元素的活态传承效果,形成新的形态和模式,成为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要途径。因此,研究引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产业融合在现代转型中的模式。

2.2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的模式

1) 物质性结构融合模式: 创新场域。

物质性结构遗产一般指古建筑、古镇、古村等不可移动的遗产^[16],这些遗产通常是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的载体。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物质性结构包含体育非遗活动的村、镇、民族文化活动园区等。旅游物质性结构包括各种景区、景点、博物馆、旅游路线等。物质性结构融合模式指体育非遗与旅游的物质结构相互融合,旨在实现双方功能的最大化整合,从而提升各自的效能,实现融合发展场域的创新。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的物质性结构融合模式主要表现形式有 2 种,一是通过利用现有的旅游物质资源结构,赋予其体育非遗的文化功能,构建出体育非遗旅游活动场所或路线等新的场域。二是以体育非遗活动所在地或综合体育文化园区为中心物质结构,向周边辐射农家乐、酒店业、餐饮业、手工艺品售卖、农副产品销售等旅游要素,形成体育特色小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民俗体验产业园等新的场域。这种融合模式不仅为体育非遗的传承提供了物质性结构平台,也为旅游增添更多特色文化,为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提供联结场域。

南岭民族走廊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各地区依托自然生态景观,打造出丰富的旅游景区。通过融合体育非遗资源,拓展旅游物质空间结构,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场域。以韶关市为例,该地区拥有悠久历史,是汉族、瑶族、畲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地,被誉为“岭南名郡”。其著名的旅游景点包括丹霞山、云门山旅游度假区、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梅关古道、冷泉滩等,还规划了 30 余条精品旅游路线,其中包括 5 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特色路线,其中青草狮、蔡家拳、舞阿妹等体育非遗被融入旅游活动之中。这种融合模式将旅游活动转化为唤醒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途径,并突显了体育非遗的特色,成为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新场域。然而,这种场域并非仅限于体育非遗与旅游的结合,

它更多地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存,形成非遗旅游多元互嵌式融合的文化场域。尽管如此,其中的体育非遗的比重通常较低。

此外,物质性结构融合模式也会以民族体育文化物质结构为中心延伸空间,通过赋予其旅游市场资源、技术等功能,形成创新多产业融合的场域,从而实现体育非遗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例如:广西河池歌娅思谷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在原有 4A 级景区歌娅思谷民族风情园的基础上建立而成。小镇原是白裤瑶民族文化的聚集地,其民众会在农历初一、十五、三月三等传统节日活动中组织开展舞龙舞狮、抛绣球、打腰鼓等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这些项目大多都被列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传承和发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延伸小镇空间,围绕小镇修建了歌娅思谷民族体育运动基地,创新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表演场域。并搭建 30 多个体育运动场所及民族体育文化表演实景舞台,其中包括 5 个国家级标准可供运动会赛事的训练基地,同时培养民族体育运动员,打造一批民族体育文化名人,传承弘扬体育文化精神^[18]。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以赛促旅,借赛兴游,继续延伸场域,先后举办白裤瑶年街节、小年节等体育非遗文化表演活动等,提高了小镇的知名度。然而,歌娅思谷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持续性延伸场域,重点兴建了白裤瑶文化商业街区、白裤瑶民俗文化遗产产业园、白裤瑶民族商品加工产业园、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园、大型实景表演舞台、旅游产业配套设施等。并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搭建智慧旅游平台,整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移动应用程序等多种技术手段^[17],使游客可通过手机应用预约体验白裤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陀螺、铜鼓舞等。同时还可借助 VR 技术实现未开放区域的虚拟游览。歌娅思谷运动休闲特色体育小镇通过深度挖掘并合理利用瑶族丰富的体育非遗,通过物质性结构融合,延伸场域,创新打造“体、旅、文、商、农”等多产业融合的物质性结构空间,成功将其独特的“文化符号”转化为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不仅能够为体育非遗传承提供更多场域,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业新平台,带来致富商机。

2) 习俗性结构融合模式: 创新产品。

习俗性结构遗产主要指某个地方长年累月流传下来的手工艺、歌舞、戏曲等具有观赏和使用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6]。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的习俗性结构是世代传习下来的体育非遗活动及其器械、技艺、规则、制度等可观、可用的元素;旅游的习俗性结构是旅游发展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管理等可用的要

素。习俗性结构融合模式是指体育非遗与旅游选取各自习俗性结构的元素、片段等渗透到对方的内容中,形成体育非遗旅游赛事表演等产品,达到产品创新的功能。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的习俗性结构融合模式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习俗性元素向旅游渗透;另外一种则是旅游的习俗性要素资源向体育非遗渗透。这种双向习俗性结构的渗透生产形成种类丰富的体育文化旅游产品,在产品内容和功能创新方面表现突出。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习俗性结构向旅游渗透,意味着将体育非遗的习俗性元素或片段融入旅游活动中,创新其表现形式与内容,从而产生多样化的体育赛事与表演活动,为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途径。以“斗牛”为例,该活动是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布依族,云南石林的彝族、水族等民族的传统体育非遗活动,起源于农耕祭祀活动,通常在重大的节日以表演和娱乐性的形式举行。斗牛非遗涵盖选购斗牛、喂养斗牛、牛王装扮、斗牛通知、牛王征战等一系列活动内容。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各民族将斗牛活动中“牛王征战”的内容元素渗透融入至旅游,形成名为“牛王争霸赛”的体育非遗表演旅游产品。此类体育非遗表演活动具有较高娱乐性和观赏性,吸引大量的观众。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斗牛传承人、黔东南州斗牛协会副会长介绍,2023年黔东南州有斗牛场300余个,斗牛总数达1万余头,每年举办观看人数万人以上的斗牛活动100余次^[19]。然而,在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地区在旅游活动中融入相似的体育非遗元素或片段,导致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产品的内容同质化现象。但不同民族斗牛的习俗不尽相同,苗族斗牛祭祀活动旨在纪念祖先,斗牛活动是在宗族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由几个寨子轮流以集会形式进行,而侗族则祭祀牛王菩萨,通过具有姻亲或联盟关系的寨子间的联姻联谊活动形式进行^[20]。不同地区都生产“牛王争霸赛”的体育非遗旅游产品,尽管在表现形式或规则上存在细微差异,但其核心内容均以斗牛为主,这种同质化的产品内容,极大削弱了体育非遗传承的原真性。

同样,旅游习俗性结构要素也积极渗透融入体育非遗活动中,促进体育非遗旅游产品的专业化、品牌化及产业化发展,进而实现旅游效益最大化。随着政府、企业及组织对南岭民族走廊旅游发展的日益重视,旅游习俗性结构要素也渗透至“斗牛”这一体育非遗活动。例如,贵州六盘水、云南卢西、江西高安土城等地均建立大型专业化斗牛场,出现职业化的斗牛养殖户,并成立斗牛赛事运营公司。为吸引更多参赛者

与观众,斗牛比赛的主办方采取招商引资、增加活动奖金、扩大宣传等策略,使得斗牛参与者由族群转变为专业企业或养殖户,斗牛活动也由娱神娱人转变为现代职业斗牛赛事。部分斗牛赛事奖金高达数十万元,甚至能在中部和沿海地区进行表演^[21]。尽管商业化运作使得“斗牛”这一体育非遗成为现代斗牛赛事,并成为旅游活动中吸引游客的重要项目,广泛宣传了体育非遗,同时带动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但其内容与目的的转变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在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的活态性与原真性。

3) 制度性结构融合模式: 创新价值。

制度性结构融合指某地举行的传统节庆活动等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历史传承性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6]。制度性结构融合模式是基于体育非遗与旅游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通过将体育非遗制度性结构资源与旅游资源重新组合,形成体育非遗节庆旅游品牌活动,以增强对体育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南岭民族走廊的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作为体育非遗制度性结构遗产不可或缺的内容,通常与旅游资源进行重组融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庆文化旅游品牌,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此类民族节庆活动不仅能够扩大体育非遗旅游活动的规模,覆盖更广泛的群体,还能迅速提升地区知名度,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如“六月六”布依节、壮族“三月三”、仫佬族“依饭节”等。为提升旅游形象、增强民族文化知名度及改善地区经济发展,广西结合自然、人文、民族等多重景观要素,成功打造“三月三·民族体育炫”“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等民族传统体育节庆品牌。活动以南岭南宁、河池、桂林、梧州等地区为主,持续一个月,涵盖9项重点活动、共计25类活动。这些活动涵盖舞草龙、抢花炮、踩高脚等南岭民族传统体育非遗文化表演活动;太极养生课、VR体育非遗实景等体育非遗体验活动;舞龙、舞狮等体育非遗巡游活动;独竹漂、抛绣球、板鞋竞速等体育非遗竞赛活动;“壮乡养生徒步”等。除此之外,还将体育非遗文化符号与民间故事融入“三月三活动”。百色市也结合地方旅游资源,设计舞龙舞狮、排鼓舞、芦笙舞等民族体育非遗文化的展示。这种制度性结构融合模式,促进更多体育非遗及传承人的参与,实现了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多元化传承。在提升经济效益基础上,借助品牌影响力,吸引大量游客体验不同的民族体育非遗文化,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然而,此类节庆活动除与其他的民族文化、非遗活动相互嵌入,往往还需要政府、企业、体育非遗的传承者和参

与者、当地村民等多元治理与利益主体,各主体的关系与联结直接影响节庆旅游活动的规模、影响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如何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尤其重要。

3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

3.1 跨越物质性结构融合的技术:数字化赋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互补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物质性结构融合模式的本质是为体育非遗传统到现代转型提供物质性载体。体育非遗的现代化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由于技术与产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南岭民族走廊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变革,随后信息化、智能化影响的进一步深化,既包括体育非遗表现形式的变革,也包括物质性结构资源的创新,呈现出不断丰富与发展的综合性的形态。因此,当前应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物质性结构融合模式的创新活力。数字化应用并非仅限于技术性应用,而是深入挖掘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的物质性资源、文化动机、表现形式及其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联,促进体育非遗传统向现代的融合互补。

一方面,鉴于体育非遗的特性,数字化赋能应致力于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体育非遗传承氛围,将物质性结构载体数字化。例如,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等,科学合理地进行体育非遗的宣传、展示与教育,将体育非遗活动与其族群的互动直观地呈现给观众。这种方法不仅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连接体育非遗与现代生活乃至全球受众的桥梁^[2]。另一方面,在博物馆、展示馆等物质性资源中,建立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数字档案系统,作为传统文化多样性保护模式的典范。通过体育非遗的传承人和参与者深入挖掘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的数字化发展需求,收集和保存南岭民族走廊传统体育文化和技艺等,构建既能够服务于南岭民族地区内部传承,又可以向外界展现文化魅力的数字资源库。同时支持数字化过程中传承人的意愿,维护体育非遗的核心价值,不仅有助于加强代际传承,也能为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理解和接触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从而实现物质性结构融合的技术革新。

3.2 跨越习俗性结构融合的文化共振:弥合发展与“活态性”的代沟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习俗性结构融合模式不是现代化旅游要素与体育非遗传统元素的冲突,而是体育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机遇。因此,需要改变习俗性结构融合的观念,使其成为传承和弘

扬体育非遗“活态性”的有效工具。针对融合发展与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之间的代沟问题,可以通过跨越融合边界的文化共振方式解决。其核心在于构建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相互作用和促进的良性环境。文化共振是一种文化受到另一种异质文化刺激时,产生融合或排斥状态,且这种状态会随着彼此间相互作用而日渐显著^[2]。即寻求体育非遗的“活态性”与旅游创新之间的和谐状态,激发体育非遗的创新创造活力,实现双方的互利共存和价值。

首先,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中的“原真性”问题。为确保体育非遗核心内涵的保护和传承,在与旅游融合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对其“原真”的误解和简化。这就要求更为审慎的形式再现策略,强调体育非遗的整体性与真实性,而非一味的追求新颖性。应深入挖掘其核心的特征与价值,结合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内容,设计出能够传递真实文化过程与内容的旅游产品。如增加虚拟和现实等平台,提供接近于原真性的文化体验。其次,建立体育非遗与旅游的协作部门。为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应用与体育非遗“活态性”的和谐整合,成立融合部门,汇聚体育非遗专家、旅游管理、艺术开发和体育管理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通过跨领域合作,确保旅游开发过程中体育非遗的“活态性”得以体现。此类部门或组织不仅是管理部门,也是体育非遗与旅游碰撞的场域,旨在探索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的最佳模式。最后,构建体育非遗旅游产品的叙事与情感共鸣。利用旅游资源,基于体育非遗“活态”传承要求,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叙事模式,讲述其起源、演变、仪式、场景等,通过故事的形式传承情感智慧与文化内涵。在追求体育非遗传播的力度与深度的同时,保留其传承的连贯性和历史脉络。不但能吸引公众注意力,激发公众情感共鸣,也是弥合旅游发展与体育非遗“活态性”之间代沟的关键环节^[2]。

3.3 跨越制度性结构的融合界限:重塑地方民众与权威话语的共生关系

南岭民族走廊体育非遗与旅游的制度性融合模式引发了地方民众与权威话语的分歧。对于体育非遗所属民众和旅游开发企业而言,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关注经济效益,而文化保护者则更关心体育非遗的发展。我们不应过分责难旅游活动对体育传统文化的介入,而应积极探寻其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路径,这实际上也是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内在要求。为此,我们应构建一个跨越界限的共生机制,重塑群众、开发者与权威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2]。

首先,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其中政府

及相关权威机构负责协调、统筹、指导和监督;企业管理人员与文化保护者作为中坚力量,负责沟通和执行;当地居民和游客处于基础地位,参与、管理相关工作,从而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共生状态。其次,建立制度保障机制。需要配置相应的监管机制和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以确保体育非遗内容的原真性,鼓励体育非遗传承人、旅游开发管理者、游客等专业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合作,汇聚多方力量共同定义和制定体育非遗与旅游融合的相关制度内容标准及其发展路径,形成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合力。最后,应建立利益共享保障机制。旅游开发已经改变了南岭民族走廊居民的生活环境,重塑当地的利益格局,并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新的机遇。然而,只有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的规划,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推动旅游业与文化环境保护、地区发展相融合,减少对单一资源的过度依赖,实现旅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保护民族走廊地区的生态资源。鼓励更多当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管理,确保收益能够回馈到地区群众,使群众成为体育非遗的积极保护者。设立反馈渠道,及时进行主体间的沟通反馈,灵活调整,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期望。同时建立长期监测机制,定期评估融合对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及时调整规划和管理策略,多方保障主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 [1] 阳宁东,鲍黎丝.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J]. 民族学刊, 2024, 15(6): 98-108+140.
- [2] 巧艳,闫春. 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张力调和:机制优化的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2010(11): 165-169.
- [3] 蔡寅春,方磊.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动力、路径与实例[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3(1): 57-62.
- [4] 时少华. 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活态保护传承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21(6): 51-60.
- [5] 吕思泓,李文鸿,吴琦,等. 传统体育非遗传承的反思与路径重建[J]. 体育学刊, 2022, 29(5): 29-33.
- [6] 唐群.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24(5): 62-68.
- [7] 王元林. 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4): 109-116.
- [8] 文冬妮. 南岭走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廊道构建[J]. 社会科学家, 2021(3): 70-75.
- [9] 陈小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特征、功能、分类[J]. 体育科学, 2022, 42(4): 14-21.
- [10] 徐世英,李京洮.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分布的新态势——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解析[J]. 人口与经济, 2023(3): 1-19.
- [11] 黄永林,邹蓓. 推动非遗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主要路径[J]. 文化遗产, 2024(1): 1-8.
- [12] 石美玉,詹雪芳. 旅游促进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国经验[J]. 旅游学刊, 2024, 39(3): 12-15.
- [13] 广西“非遗经济”点亮新生活[EB/OL]. [2024-11-17]. <http://www.ihchina.cn/art/detail/id/22707.html>
- [14] 林继富,汤尔雅.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文化遗产, 2024(2): 1-8.
- [15] 陆霓,张继焦.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 41(1): 159-165.
- [16] 张继焦. 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J]. 西北民族研究, 2020(3): 178-189.
- [17] 刘丽珺,张继焦.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下文化遗产在文旅演艺中的构建关系[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4(6): 128-136.
- [18] 抓特色树品牌 重融合强示范——广西歌娅思谷民族体育运动基地获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EB/OL]. (2019-05-13)[2024-09-28]. <https://www.sport.gov.cn/n14471/n14491/n14528/c907179/content.html>
- [19] 文化 | “斗牛相思”,交流和情谊绵绵无绝期[EB/OL]. (2024-04-20)[2024-10-0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01321
- [2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 黔东南斗牛文化志[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
- [21] 王晓辉,董强.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斗牛文化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思路[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7): 105-110.
- [22] 常国毅,马知遥. 数字时代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审思[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5): 136-146+182.